

特朗普孫女學普通話足令浸大某些學生羞慚

近日，浸會大學有學生因為學習普通話的問題鬧得不可開交。學生不服校方處分，反向校方與師問罪，錯上加錯，令人痛心。「中文是21世紀最重要的語言」，學好普通話已成世界潮流所趨，連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孫女、「投資大師」羅傑斯的女兒都熟練掌握普通話，以學普通話為榮，浸大少數搞事學生，不感慚愧、不從中獲得啟示嗎？他們逆流而行，不僅錯失寶貴機遇，更會被時代所淘汰。大學生有知識有頭腦，應該看清世界發展的方向，積極擁抱中國文化和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作出明智抉擇。

陳南坡 太平紳士 香港南區各界聯誼會會長 廣東省政協港澳區委員



特朗普的孫女阿拉貝拉能說流利普通話早已人所共知，更成為特朗普對華外交的「重要武器」。特朗普早前訪華，特意用平板電腦向國家主席習近平展示阿拉貝拉用普通話表演，習主席讚不絕口，阿拉貝拉也成為中國的網紅；有「投資大師」「商品大王」之稱的羅傑斯，被股神巴菲特稱為「對大勢的把握無人能及」，曾與大名鼎鼎的國際金融大鱷索羅斯共同創立量子基金。羅傑斯的一對女兒，日前亦在接受本港媒體採訪時，用流利的普通話向港人問好及拜年，一口氣說完：「一帆風順、二龍騰飛、三羊開泰、四季平安、五福臨門……」等吉祥話。特朗普、羅傑斯悉心引導子孫學習普通話，反映人家看到世界發展的大勢所趨。

中文是21世紀最重要語言

羅傑斯至少十年前就看到了中國的崛起，他開

宗明義地說，「21世紀屬於中國」「中文是21世紀最重要的語言。我覺得我給女兒最重要的財富就是了解中國。」於是他決定讓女兒們一出生就學中文。連美國總統、大亨的晚輩都對學習普通話趨之若鶩，已經懂得背成語、讀唐詩、唱中國歌曲，熱愛中國文化，從小為把握中國機遇未雨綢繆，普通話水準已經好過不少香港大學生，香港那些叫嚷「取消普通話考試」的學生，有沒有感到自慚形穢，是否有危機意識，擔不擔心未來會把工作機會拱手讓人，有否意識到要放遠目光，與時並進，急起直追？

政客在背後推波助瀾

事實上，浸大「佔領」語文中心事件持續發酵，發展至今，已經不是學習普通話爭議那麼簡單，可以看到不少政客參與其中，在背後推波助瀾，煽動學生無理取鬧，小事化大，影響校園的教學秩序和安寧，更借學習普通話爭議挑起、刺激香港和內地的矛盾，破壞兩地和諧。國家發展進入新時代，「一帶一路」、粵港澳

大灣區重大規劃的落實，中央不斷落實便利港人在內地生活、工作的措施，給香港創造巨大機遇，為香港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提供施展才華更廣闊的空間。香港要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優勢，繼續扮演好聯繫國家和世界接軌的橋樑角色，擁有掌握兩文三語的人才必不可少。香港的大學生學好英文、中文和普通話，是未來安身立命、實現抱負的最基本技能和條件。

害怕困難而不學普通話，甚至以政治化的心態抗拒學習普通話，抗拒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吃虧的是年輕人自己。港大的衝擊校委會事件，有學生受到法律的懲處，個人履歷留下污點。浸大乃至全港的大學生，是否應以為戒、提醒自己勿重蹈覆轍？

大學生是社會精英、未來棟樑，肩負建設社會的重任，應該有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不受別有用心的言論誤導和唆擺，言行舉止須依法守紀、尊師重道、專心學業，積極在學識上、思想上裝備自己，才是對自己負責，不辜負父母的養育之恩和社會的期盼。

普通法不是反對「一地兩檢」的護身符

孫成 法學博士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較早前，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分別就《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一地兩檢」的決定》發聲明，二者均質疑，即使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從大陸法思維看法律依據充分，但這一結論卻無法通過普通法的檢視，考慮到基本法規定香港在回歸後繼續奉行普通法，因而，這份決定在「普通法視域」中法理基礎成疑。應承認，這種以「普通法與大陸法二元對立」為思維導向的觀點，在香港法律界人士中具有相當的市場，並且由於普通法自身的專業性，以及社會大眾對法律專業團體的心理崇拜，也對香港社會思考「一地兩檢」問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對此，單從「大陸法角度」進行反駁始終存在「雞同鴨講」的缺憾，無助於法理問題的釐清。在此背景下，本文嘗試換位思考，從普通法的角度，對目前圍繞「一地兩檢」的決定進行解析。

此次香港法律界對「一地兩檢」的決定的質疑，從學術角度可以歸納為三類：

第一，不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憲制地位，也不反對決定中關於「一地兩檢」合憲合法的結論，但認為此份決定的內容過於單薄、說理不充分，與其所承載的巨大憲制價值不相稱。在普通法制度下，司法是解決法律爭議的主要路徑，遵循先例原則以及對抗式訴訟制度的存在，更使得普通法地區的法院在判決書中十分注重「過程思維」的運用，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奉行大陸法的權力機關，長期的立法實踐，使其更為習慣於運用「結果思維」將紛繁複雜的問題簡明扼要地表示出來。這種思維方式的差異確實會導致長期接受普通法訓練的人士，對「一地兩檢」的決定，產生只有結論沒有說理的疑慮。應指出，這兩種思維方式只是側重不同，並無絕對的優劣之別，如何取長補短，兩地學界其實具有相當大的交流空間，這種對話也有利於基本法實施機制的不斷完善，為基本法共識性理論的形成奠定基礎。

第二，不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本身的憲制地位，但對此次決定的結論存在質疑，認為根據普通法文義解釋的方法，決定的內容無法從任何一項基本法條文中得到支持。首先需要澄清，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普通法系，文義解釋都不是解釋方法的全

部，當規範的字面含義已經不足以有效處理有關法律問題時，兩大法系都主張要綜合運用目的解釋、體系解釋等方法加以判斷，這種情況在解釋字面含義寬泛的憲法性法律中十分常見。其實，相較於大陸法，強調「進理化主義」的普通法更加講究因地制宜、不斷變化，正是由於這個特點的存在，才使得古老的普通法能夠穿越時光、突破地域、跨越文化，形成一個具有共同特徵而又紛繁多彩的普通法世界。以此反觀此次「一地兩檢」的決定，我們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分析基本法第2條的立法目的，並綜合考察基本法第7、22、118、119和154等條文的規範含義，認為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並未改變特區的行政區域範圍、沒有減損港人的權利，因而屬於特區高度自治權的範圍，並由此得出有關《合作安排》符合基本法的判斷，這與公認的普通法理念並不矛盾。

第三，從根本上質疑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法律效力，在此種情況下，該份決定的結論和論據也就無從談起了。普通法的發展歷史，使它天然蘊含著一種以司法者為法秩序核心理念，這與以立法者為法秩序核心的大陸法系形成鮮明對比。正是在這種理念的影響下，香港部分法律界人士始終將「人大釋法」與「人大決定」置於香港法治的對立面加以詮釋。但回歸後香港普通法依託的效力基礎已經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從肯定英國憲制秩序有效的規定，轉為肯定中國憲制秩序有效的規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取代《英皇制誥》與《皇室訓令》成為香港憲制秩序的基礎，而在這套新憲制秩序中，無論是「人大釋法」，抑或「人大決定」，均是香港法律淵源的組成部分。在這一背景下，如何將其與固有的普通法相協調、相銜接，才應是兩地學界討論的重心，如果連這個憲制基礎都不承認，香港普通法將失去生存的根基。

由上可知，普通法只是一種法律思維方式和法律制度形式，它不具有高人一等、絕對真理的意涵，也不應成為專業利益凌駕社會利益的藉口，更不能變為維護特定政治利益的護身符，否則所謂的「普通法思維」將演化為一種打着「普通法」旗號的政治思維，而這恰與真正普通法的核心理念背道而馳。

反對派初選龍門任搬鬧劇收場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社聯理事長



反對派的立法會補選前哨戰鬧劇收場，在九龍西「初選」排名第二的馮檢基疑似「被退選」。事前各陣營打鑼打鼓簽訂「君子協議」，把「民主」「民意」吹噓得天花亂墜，但當選舉結果不合意，說好了的龍門可以任搬，試圖以一句「勝算為重」，讓「大佬」說了算。

反對派一向都是雙重標準。他們高喊「民主」，譴政改方案是「篩選」，卻美化自己訂出的補選機制是集中票源的「初選」。反對派不承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制權力，就譴責人大常委會「黑箱作業」，但當「初選」結果有風險，他們卻「大條道理」欲把機制一手推翻。

反對派經常「指控」政府「離地」，但原來為了「大局」，參與「初選」民調和

投票的民意，他們可以視為無物。近日，反對派法律學者更散播歪理，聲稱現在面對「威權政府」，支持者選「浪漫地」說一定只會投票給自己最想支持的人是「超離地」，又斥選民「含淚投票」的說法是非常幼稚云云。

最可笑的是，當「初選」安排千瘡百孔，甚至整個陣營一開始未有周詳考慮因違法宣誓而被取消議員資格的姚松炎，是否有參與補選資格的問題時，反對派反而諷過政府，宣稱誤中了對手的選舉「分化」策略。反對派「公我贏，字你輸」、「自己永遠是對的」的賴皮嘴臉，實在叫人受不了。

香港社會需要真正為民服務的代議士，而非言不一、待人嚴律己寬的政客。立法會補選在前，盼望心清眼亮的選民，不要再聽從政客的唆擺，能為香港投下神聖一票，壯大建設力量。

違反基本法者自我剝奪選舉權

王偉傑 群策匯區常務理事

「香港眾志」常委周庭依例被選舉主任裁定其提名資格無效，正反映出基本法在彰顯香港法治精神上具有牢不可破的地位，亦說明了任何形式的政治主張均不能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香港眾志」列「民主自決」為綱領，亦在公開場合提及到「全民公投」是其中一個選項，跟基本法第12條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背道而馳，而周庭在選舉表格中亦填上了「香港眾志」為其政治聯繫，故選舉主任作出了提名資格無效，絕對有足夠的實證和法律依據，而非反對派所言是政治決定。簡而言之，是周庭及其所屬政黨親手毀掉自己的參選資格。

根據基本法第12條，香港是享有高度自治而非完全自治的行政區域，亦解釋了為何香港的行政長官要定期向中央政府述職；而基本法第一條已清楚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故以任何形式包括提出「公投」決定

香港的命運或單方面宣佈香港「獨立」已逾越了基本法及中央政府的底線。「香港眾志」沒有撤回「民主自決」作為其綱領，本質上等同拒絕承認基本法，試問公眾又如何相信一位其政黨背景拒絕承認基本法的立法會參選人能確切履行基本法？情況猶如一位多次在社交平台及公開場合中表示自己漠視交通規則的人又如何讓公眾放心他會安份守己當一個稱職的公共交通工具司機？一位職業司機尚且需要顧及市民大眾的安危而遵守交通規則，手握監察政府大權的立法會議員又豈可只顧推動自己政黨的綱領而將基本法置之度外？

基本法第26條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今次的立法會補選也不例外。反對派將周庭今次被選舉主任裁定其提名資格無效的事件「污名化」，誣蔑特區政府剝奪參選權利，目的在於誘導選民忽略周庭及其政黨漠視基本法的事實。冀望香港市民都有一對雪亮的眼睛，不要輕易被反對派的口號蒙騙。

為事前監管國企境外投資鼓掌

黃忻強 資深財經評論員

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已經進行了多年。在一定程度上有了進步和實效。近年來，內地更鼓勵國有企業走出去，從事有效益的境外（包括港、澳、台地區）投資，特別是支持習主席提倡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擴大和開展貿易和合作關係。不少國企都採用不同的融資方法，有的快步上馬，有的踴躍欲試。誠然有些國企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成果，有的卻遲遲未見效益，有的甚至被一些大小「老虎」、不法分子借走出去的機會偷逃稅款，清洗黑錢，抬高當地房價營私利……不一而足。

於是，財政部制定和公佈了最新的《國有企業境外投資財務管理辦法》，去年年底起正式施行。該辦法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和《企業財務通則》等規定，在尊重企業產權關係、內部治理結構和經營自主前提下，明晰各方財務管理職責。該「辦法」規定，企業應在董事長、總

經理、副總經理、總會計師（包括財務總監、首席財務官）等領導成員中，確定一名主管境外投資財務工作的負責人，確保決策層有專人承擔財務管理職責，再不能出了問題，互相推卸責任。同時，要以併購、合營、參股方式投資境外目標，進行行業、稅收、法律、國際政治等調查形式書面報告，重視經濟風險和自身財務風險。並要求企業組織內部團隊或者委託具有能力並與委託方無利害關係的外部機構對境外投資開展財務可行性分析。

內地採取新措施在事前監管國企向外投資，無疑在向境外投資的路上加了一道關卡，在事前可以阻止一些未及格或無效甚至負效益的國企，借參與「一帶一路」的貿易和發展經商之藉口，一窩蜂地把資金送出國門；也有部分國企的不法分子，借對外投資而大撈一把！這一監管辦法，比事後的審計和出了問題後再查辦更有效，更能及時防止國家財產的損失！筆者為之鼓掌！

中美貿易摩擦增大 惟開戰難

張敬偉

特朗普來到了達沃斯，主要講了四件事：誇耀其執政一年的政績，強調其減稅政策的利好，宣示大幅減少不必要的監管，還有就是對其貿易保護主義立場進行辯護。

他的政績展示，無人關心。國際社會關注的是其貿易立場——特朗普強調美國對於單方面的經濟行為，美國不會睜眼閉眼了，其中包括大規模的知識產權的偷竊，還有補貼等。

「知識產權的偷竊」「補貼」云云，顯然針對中國。特朗普是在達沃斯論壇向中國發出貿易戰的信號嗎？以此證明他此前強調的要對中國「知識產權的偷竊」發出「巨額罰款」？

進入2018年以來，美國對華貿易摩擦就沒有消停過。1月19日，美國貿易代表署網站上，兩份分別關於中俄的報告赫赫在列，指責兩國違反當初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和規範。報道中，美國稱當初「錯誤地」支持了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

美國對華貿易獲益良多

在此之前，美國不僅攬黃了螞蟻金服和華為對美國的兩項投資計劃，而且將淘寶等三家電商平台以及六家線下公司列為「惡名市場」。剛剛，美國還動用「201條款」，對進口洗衣機和光伏產品加徵「保障性關稅」。在未來4年，美國還將對進口太陽能電池徵收高額關稅。至於特朗普借所謂的知識產權保護對中國進行怎樣的「巨額罰款」，還有待觀察。肯定的是，這符合特朗普誇張任性的風格。

特朗普對貿易很敏感，對中美貿易更是點滴在心頭。競選時期，特朗普就宣稱會將中國納入「匯率操縱國」，並準備在上任時對華實施45%的懲罰關稅。當然，特朗普並沒有這麼做，因為他也知道這麼做是難以把柄的「雙刃劍」。但是這並不妨礙特朗普一方面通過元首外交從中國那裡獲得更多貿易利益（2,500多億美元的大合同），另一方面對華製造不間斷的貿易摩擦。譬如，去年8月份特朗普簽署備忘錄，授權美國貿易代表實施「301調查」。

雖然美國對華輸美商品，實施連續多起「雙反」調查，且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中美貿易戰似有「一觸即發」之勢。但是目前看還是「摩擦」而已。因為中美貿易戰是把雙刃劍，對特朗普而言，這把雙刃劍是不可以胡亂飛舞的，否則「殺敵未必一千」或致「自戕八百」。當然，對於特朗普身邊的對華強硬分子，卻希望特朗普和中國發生貿易戰。

特朗普很矛盾，一方面他要繼續和中國就貿易問題進行理性的談判，為美國獲得貿易利益。在這方面，特朗普已經嚐到了「甜頭」——除了2,500多億美元的大合同，美國輸華商品也獲得前所未有的突破。從美牛到轉基因農作物還有能源合作，如果特朗普和中國發生貿易戰，上述成果都會成空。



中美貿易關係對雙方均非常重要。

中美貿易衝突就是「雙輪」

對華貿易，更像是特朗普政府的對華博弈手段，而不是零和遊戲的工具。特朗普要達到的目標有兩個：一是緩解國內政治壓力，二是從中國獲得更多貿易利益。要達到這一平衡，特朗普並不願意對華展開一場貿易戰，而是進行一場聲勢浩大但又控制得住局面的貿易摩擦。讓中美貿易「摩擦係數」更大一些，但又不能失控，是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貿易策略。正如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高級研究員司各特所言，中美貿易目前只是「摩擦」不是「戰爭」，如果無法實現合作，中美目前的貿易衝突就是「雙輪」。

無論是特朗普的減稅計劃還是大規模基礎設施計劃，和中國進行全方位的貿易合作，才更能讓這些政策效應得到更好釋放。否則，特朗普政府不僅難以做到「美國優先」，也無法實現讓美國「再偉大」。更要看到，1月16日，中美兩國元首進行了新年伊始的第一次通話。和去年10次通話內容一樣，核心內容還是貿易和朝鮮核導。筆者以為，相比朝鮮核導這個結構性、多變化的地緣政治難題，中美貿易才是重中之重。

兩國元首能夠頻繁「熱線」，凸顯中美關係維持在建設性範疇內。兩國元首將貿易關係作為「熱線」重點，更折射中美貿易的深度利益攸關。因此，特朗普在達沃斯論壇發出的好戰的貿易信號也好，對華要實施「巨額罰款」也罷，都是特朗普「美國優先」的策略手段。